順從・拒絕

流 沙

凌晨兩點，看完了顧長衛的作品《立春》，身體非常疲憊，但卻睡不着。因爲，這部電影中的有些東西，打動了我。

我甚至可以說，《立春》具有非凡的「普世」價值。那就是，每一個人都有可能成爲別人的喉中刺，會與世俗或是某個圈子格格不入。當你的生活態度與他人的生活態度水火不相容時，你會怎麼辦？

大概只有兩種答案，一種是胡金泉給出的答案，一種是王彩玲給出的答案。

胡金泉是個大老爺們，跳了十多年的芭蕾，他視舞蹈藝術爲生命。但人們卻把他與泰國的「人妖」相比，還被人當着自己老母親的面，被人罵爲「二姨子」（不男不女的變態男人）。胡金泉是別人喉嚨中的一根刺。他以爲只要在一個城市裡呆得時間長了，這個城市就會包容他，但是，這個城市一直沒有包容他。他當然得不到愛情，其實他不需要愛情，他只需要藝術，但世俗社會卻不這樣認爲。胡金泉希望與同樣單身，被人視爲另類的女高音歌手王彩玲假結婚，爲他人製造一種他們已被世俗馴服的生活，但遭到了王彩玲的拒絕。胡金泉無奈之下，製造了對女學員的「假強姦」事件，他以這種方式證明自己仍然是個男人，他說，「這下，魚刺從他們喉嚨裡拔出來了，他們踏實了，我也踏實了。」

胡金泉以這種方式，證明自己也是世俗中人，極其悲愴和痛苦。那是一種不是「我改變了世界，而是世界改變了我」目標虛無。一個人要秉持高尚是多麼的困難，那可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戰鬥啊。

王彩玲是一個醜陋的女人，但上蒼卻給了她一副好嗓子，她的夢想是調到北京，成爲歌劇院的首席女高音。但是，夢想卻照不進現實，她一次次地碰壁，卻又一次次地努力着。在別人眼裡，她是一個相貌醜陋，但卻自視清高的女人，她與世俗社會決絕着，只爲自己的靈魂活着。她有過「實在捱不下去，索性找個人嫁了」的想法，但她卻沒有付諸行動，她堅守着。如果有妥協的話，抱養了一個唇裂孩子算是小小的妥協吧，但她始終沒有被世俗社會所打倒，她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中，沒有人能左右她。

面對世俗生活，胡金泉和王彩玲，給了我們兩個不同的選擇，是順從，還是拒絕？

其實每個人都經受着這樣的拷問：你的生活觀會與別人衝突，你也有可能成爲別人喉中刺？那你會站在胡金泉那邊，還是王彩玲這邊？

這都是一個殘酷的選擇。

這個世界，總是讓隨波逐流者得到最大的便宜，而給特立獨行者以無情的詆毀和打擊。那種巨大的力量就潛伏在世俗社會中，你是角鬥不過的。

那麼，王彩玲，或是胡金泉，他們是信念的英雄。這樣的英雄，不斷地在我們的生活中上演，他們，往往得不到援手。

但是，請給他們以尊重，好嗎？

悲愴十年祭
——紀念廈門大學陳汝惠教授

陳慧瑛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恩師汝惠教授仙逝轉眼十度春秋。九月四日，是十周年祭。

十年來，在廈門大學的山崖水畔，在杭州的西子湖邊，在京華的長街短巷，汝惠師清癯慈和而略帶憂鬱的面容，總會不期然地浮上心頭。那一份長長久久揮之不去的思念，非紙墨可以形容，以至多少次握管哽咽，難以下筆。

一九六二年金秋，我考入廈門大學中文系，那一年，我虛齡十六，是全系年齡最小最不起眼的小不點。汝惠教授是我們寫作課的授業師長，那一年，他四十五歲，清朗、斯文、彬彬有禮。記得第一次上寫作課，汝惠師梳一絲不苟發光可鑒的三七分頭，穿一件半新不舊的雪白短袖富春紡襯衫，走近講壇時，將教案端端正正放在桌子中間，溫和地微微一笑，向大家點點頭，操一口不徐不疾不輕不重的吳儂軟語，親切地開講：

「同學們！你們是解放以來全國高考錄取率最低的一屆，能考上大學特別是重點大學很不容易，你們是全國考生中的佼佼者，今後五年，我能和你們一起學習，這是我的幸運！」

聽了如許激勵人心又如許謙遜感人的師訓，年少的我，有一種流淚的衝動。因爲，我深深知道，在講究階級鬥爭的時代，如果不是由於當年政策略有所鬆動，像我這樣僑港台關係俱全家庭社會關係複雜的學生，即使成績再好，高等學府的大門也是難以問津的。

接着，他轉身在黑板上寫下：「第一課：今年高考作文分析」。那一年正處國家三年困難時期，「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國策，對當時事無巨細與階級鬥爭掛鈎的政治氛圍有調節意味，於是高考作文命題也隨之變化。

「解放以來，歷屆的作文題大抵是《我的母親》、《記一件有意義的事》、《心中的話對黨說》等等，今年的作文題一是《雨後》、一是《說不怕鬼》，這兩個題目，一改以往套路，給學生充分想像的空間，尤其是《雨後》，文學性強，檢驗的是學生的文學積累，因此，本屆高考，出現了不少佳作……」

幾十年過去，汝惠師那渴盼改革洋溢喜悅的聲音猶繚繞耳際，那一手靈動飄逸風骨峭拔的板書，也令人過目難忘。

我因個子小，坐在第一排。下課時，想不到汝惠師竟走到我面前：

「小同學，是陳慧瑛吧？」

我愕然。他卻指着手上的學生座位表一排四號，輕聲說：

「你在這兒！對吧？我看過你的《雨後》，是本屆作文的最高分，想不到這麼小。上課時，你很認眞記筆記，很好！天賦加勤奮學習，是一切事業成功的基礎，寫作也一樣。」

聽了汝惠師和藹的話語，小小的我，除了點頭，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在我心中，因爲感動，依然有流淚的衝動。汝惠師待人謙和溫潤令人如浴春陽的君子之風，也令我終身難忘！

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六年四年間，我們每周兩節或四節的作文課，都在汝惠師盡心盡職的授業中度過。汝惠師的教育方式是深入淺出，不僅講授理論、概念、原則等基本知識，更重視發揮學生的個性特長，因材施教。不管你喜歡小說、散文還是詩歌、雜文，汝惠師一律給予鼓勵、教導。他督促我們多多閱讀中外名著，他說：「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要我們把前人和別人的文學成果，化作自己的營養。他一「作爲中文系學生，寫作是基本功，但高等學府只是給你學習的鑰匙，作家是寫出來的，不是教出來的。廣閱讀、多思索、勤練筆，熟自然生巧。」因此，班上學生的寫作題材、體裁、筆法、語言各有千秋，決無十人一面、千篇一腔之弊。

汝惠師授業的認眞執著，也令人感佩終生。每一堂課前，他總要寫下詳詳細細的教案；每一堂課上，他總是寫上整整齊齊的板書；學生的每一篇作文，他都要密密麻麻地批改、一絲不苟地書寫評語；優秀的範文，他總要在講台上熱情介紹、逐段點評；學生有疑難，上課時間有限，他便把學生請到家中，不厭其煩地釋疑解惑。

四年間，我記不清給汝惠師提了多少難題添了多少麻煩，也記不清朝朝暮暮多少次到他家中求教；四年間，我的作文成績篇篇滿分，這成績，是汝惠師用心血諄諄教誨凝結的果實！我後來的文學創作，汝惠師是啓蒙的嚴師、恩師。畢業離校後，每當我翻開當年的作文本，看到那字裡行間紅筆的密密圈點，看到每篇長則一頁短也數行、有點撥有糾正有批評也有激勵的評語，回想恩師的敬業精神和人世滄桑，總難免潸然淚下！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陳汝惠與夫人李荷珍攝於杭州

轉眼到了一九六六年，我上完大四正準備升入大五開始實習時，「文革」十年浩劫開始，廈大也難倖免，鋪天蓋地的大字報中，居然有「打倒反動三青團骨幹、反動學術權威、牛鬼蛇神陳汝惠」的巨幅標語，名字上面還打着紅色××，雖然我不了解汝惠師的歷史，但在我的深心裡，實在無法將忠於教職、敬業愛生的汝惠師與「反動」聯繫在一起。我暗暗爲恩師揪心。不久，汝惠師被打入「牛棚」。除了挨批鬥，他的任務，就是種地、掃街、餵豬，每天兩次，必須去食堂挑泔水然後繞過半個校園到豬圈。當時的我，因爲是僑生，屬社會關係複雜之流，列位在「黑九類」之後，自然也沒有參加紅衛兵的資格，見昔日高等學府，而今滿目瘡痍、斯文掃地，「鳩雀巢壇、鳳凰委地」之歎，悲悲涼涼地充塞心田。一日黃昏，見汝惠師挑一對泔水桶，低頭含胸，搖搖晃晃步履艱難地橫穿馬路，我上前叫一聲「陳老師」，他抬眼看了看我也沒回應就走了。我尾隨其後到了敬賢一樓拐彎處，一把按住扁擔，不由分說：「陳老師，我們一起抬吧！」汝惠師驚慌地直擺手：

「不行不行，你一幫忙，說不定也跟着上大字報！」

我說不怕，不就是一起勞動改造嗎？於是，當時「逍遙」無派的我，每日與汝惠師相伴，一起抬豬食、掃地。過了不久，校園裡的大字報欄上，果然出現了「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陳汝惠的孝子賢孫陳慧瑛……」之類的標語和文章。陳老師大概也看到了，第二天便不讓我幫忙。我說：「我在校的日子也不多了，您別攔我！」從汝惠師憂鬱的雙眸裡，我讀出了欣慰。那是一段彼此即使相聚也無言的歲月，但心中的溫馨永難忘卻！

當時，我的宿舍在豐亭二三〇八室，汝惠師住在敬賢二三〇二室，隔着十米左右的柏油路，兩樓相向，兩室相望。一九六八年，在滿城刀光劍影、鳳凰樹愁紅慘綠的秋天，我們終於離開朝夕相處六度春秋的廈大校園各自浪跡天涯。告別母校前夕，我站在宿舍門前眺望恩師窗口，有一種依依惜別有一種徹骨悲哀有一種前程茫茫的辛酸，令我淚濕青衫！

從此我遠離東海之濱棲身太行荒山，三千六百五十個晨昏，「十年生死兩茫茫」。一九七八年底，歷盡萬苦千辛的我回到故園，在《廈門日報》「海燕」文藝副刊當編輯。他鄉歸來重返母校，我首先拜訪的就是恩師鄭朝宗先生和汝惠師。一晚，我來到敬賢二樓三〇二室，舉手敲門之際，竟有恍同隔世之感。汝惠師見到我，快樂如小孩，一把將我拉進屋裡，握住我的手，說：

「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

那一年，他六十花甲，當年光潔的兩鬢，已染華霜！師母李荷珍老師爲我端來熱茶：

「這些年，我們總在想念你……」

汝惠師急急返身回房，拿出一份材料，滿面喜色地送到我手上：

「改正了！改正了！」

原來，「文革」中所謂「反動黨團骨幹」之說的眞相是：抗戰期間，汝惠師懷着滿腔愛國熱情和對日寇的刻骨仇恨，投身地下三青團抗日活動。抗戰勝利後，出自對國民黨挑起內戰以及專制腐敗的失望和憤懣，他登報公開聲明脫離三青團，甘守清貧，潛身教職。在極左歲月，汝惠師背負沉重的歷史包袱，受盡委屈壓抑。幾十年間，在數不清的「交代」、「批判」與「自我批判」中悒悒度日。直到「文革」結束後的一九七八年十月，一紙公文摘掉「內控」帽子還汝惠師半世清白，數十載的冤案得以昭雪，漫長的淒風苦雨歲月才畫上句號。我看着恩師那渴求理解卻無怨無悔的慈容，淚珠，一顆顆滴落茶杯裡。

（上）

方敬的《風塵集》

許定銘

我一九七〇年代讀方敬的詩集《雨景》和《行吟的歌》，已深深感受到詩人透過抒情送過來的詩意，一直認爲他是一九四〇年代不可多得的詩人，想不到他的散文也相當出色，而且第一本單行本不是詩集，是這本散文《風塵集》（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一九三七）。

《風塵集》是三十六開本，一五一頁，收《荒城》、《老人樹》、《童年》、《幽居》、《黎明》、《路遇》……等十四篇散文，大部分取材於周遭的生活，這裡有童年生活的回憶，鄉野傳說的淒清，流浪的風塵歲月，深厚的友情……都是些抒情氣息濃厚的詩意文字。

《風塵集》是斬以編的《現代散文新集》之一，這套叢書不多，還有巴金的《短簡》、蘆焚的《黃花苔》、嚴文井的《山寺暮》、蕭乾的《落日》、臧克家的《亂莠集》和何其芳的《還鄉日記》。叢書封面畫一，尚幸色彩鮮明，十分搶眼，可惜只印二千本，不常見。

方敬（一九一四至一九九六）原名方家齊，四川萬縣人，畢業於北京大學英文系，在北京住過不短時日，《風塵集》就寫在這風沙之城。一九四〇年代在桂林編過《工作文學叢書》，他的散文集還有《保護色》、《生之勝利》和《記憶與忘卻》。

奧運健兒獎金「三級跳」

夏威

北京奧運曲終人散，中國體育代表團取得了歷史最佳成績，總共獲得五十一枚金牌和一百枚獎牌，金牌榜首次超越美國。奧運結束後，六十三位奧運冠軍和其他獲獎選手衣錦還鄉，接受慶功獎賞，作爲國人對體育健兒爲國爭光拚搏精神的表彰與激勵，榮膺奧運桂冠的選手不僅享有民族英雄般的巨大榮耀，物質獎賞也十分豐厚。

對於在國際大賽中表現出色的健兒予以獎勵，本來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中國在過去很長一段時期內，卻有過「談獎金色變」的怪現象。當年在左的思潮籠罩下，體育界與各行各業一樣，不敢輕言獎金。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國著名「蛙王」穆祥雄曾三次打破世界紀錄，但他只有獎杯而無獎金。另一位「蛙王」戚烈雲在一九五九年打破一百米蛙泳世界紀錄，也是只有榮譽獎而無物質獎。乒乓球選手容國團一九五九年爲中國取得第一個世界冠軍，六十年代名將莊則棟三次蟬聯世界乒乓球單打冠軍，也與獎金無緣。

本屆奧運會開幕式執旗手，中國第一個打破女子跳高世界紀錄的鄭鳳榮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當年她打破世界紀錄時才二十歲，那時既沒有優越的訓練條件，沒有科學的訓練器材，也沒有獲得過一分錢的獎金鼓勵。但是，憑着對體育的熱愛和刻苦耐勞的精神，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蹟。當時苦練、拚搏的動力就是爲國爭光。她說，「當初我們得冠軍的時候，獎品是精裝的《毛澤東選集》。工資也只有幾十塊錢。」

據披露，直至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有關方面才開始研究頒發獎金的問題，一九七八年鄧小平曾提出：「獎金一定要搞，問題是怎麼搞得更合理，目的就是鼓勵大家上進」。到了一九八四年七月，闊別奧林匹克大家庭多時的中國決定參加洛杉磯奧運會，中國國家體委議決，獲得金牌選手可獲得六千元人民幣獎金。

隨着國力的提升，從一九八四年以來，中國發給奧運金牌以及其他獎牌獲得者的獎金數目呈水漲船高的局面。一九八八年的漢城奧運會，獎金加至一萬五千元；一九九二年的巴塞羅那奧運會和一九九六年亞特蘭大奧運會八萬元；二〇〇〇年的悉尼奧運會提升至十五萬元；二〇〇四年的雅典奧運會增加到二十萬元。今年北京奧運會加碼到三十五萬元，二十四年間獎金數目是當年的五十多倍。

今屆奧運結束後，除了國家和各省市重獎金牌選手之外，一些地方對於訓練他們成才的教練員和後勤人員，也給予一定的獎勵。例如福建龍岩市便獎勵國家舉重隊男隊主教練陳文斌人民幣一百萬元；國家羽毛球隊教練李永波、湯仙虎人民幣各一百萬元；國家蹦床隊教練胡星剛人民幣一百萬元；奧運會舉重冠軍啓蒙教練員朱日平、羽毛球冠軍啓蒙教練員陸群菱、蹦床冠軍啓蒙教練員曹家紅人民幣各十五萬元；後勤保障人員人民幣六十五萬五千元。有論者表示，這種做法很值得提倡。

中國體壇一些過來人認爲，除了獎金之外，選手的退役保障更應該受到社會關注。年逾古稀的穆祥雄說：「我希望奧運會之後，大家更關注運動員的退役轉型問題，解決那些普通運動員退役後的出路問題才是關鍵。」鄭鳳榮也認爲，對運動員的物質經濟保障應逐步完善，爲此她呼籲應成立運動員基金，幫助過去爲國家做出貢獻的老運動員。

唐僧又名「三藏」

陸茂清

《西遊記》小說裡，稱唐僧爲「三藏」屢見不鮮，如「唐三藏」、「三藏法師」、「三藏師徒」等等；後人依據《西遊記》改編的戲曲、影視中，也多有是如稱謂。故而人都知「三藏」即唐僧，唐僧即「三藏」。

或以爲，「三藏」是唐僧的法號，其實非也，這是對唐僧的尊稱。這一尊稱的由來是這樣的：

先說「三藏」的「藏」。按佛門術語的原意，爲盛放物件的筐篋，含無所不有、包羅萬象之意，佛教藉以用來概括全部佛經，近乎現在所說的「全書」之類。正因爲這樣，「藏」成了佛家經典的總稱。

按佛家經典內容區劃，「藏」分作三大類。

第一類是素怛纜藏，即經藏，指佛教始祖釋迦牟尼的學說、說教；

第二類是毗奈耶藏，又稱律藏，指佛門的清規戒律；

第三類是阿毗達磨藏，即論藏，指釋迦牟尼的高徒對於經藏的闡述與註釋。

唐僧經九死一生艱難跋涉，終於抵達佛教發源地的古印度，先在名剎那爛陀寺隨高僧戒賢學習了五年，後遊歷各地，拜會多個精通佛學佛法的長老，得閱多部佛家經典。經整整十六年，取得了全部「三藏」眞經。返回大唐京都長安後，閉門整理翻譯，歷十九個年頭，譯出七十五部佛經計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合一千三百餘萬字。

古時，尊稱通曉佛經的和尚爲「三藏」。唐僧本就是大唐有名的法師，又已對「三藏」眞經鑽研精深，融會貫通，名副其實前無來者的高僧。吳承恩出於對唐僧的敬仰，在《西遊記》中尊稱其爲「三藏」，隨着《西遊記》的廣泛傳播，爲各式人等皆知，只是不明所以然罷了。

愛的蜜語

匡吉

情侶與夫婦之間如何稱呼，各個國家和地區由於文化背景不同，其稱謂往往多有顯著的差異。

古代猶太人把心愛的人比作「駕帕羅（埃及王）車的牝馬」，還比喻爲恩蓋迪葡萄園中指甲花的花萼，或比作百合花、青羊、小牝鹿等。

法國人把自己心愛的人稱爲「小捲心菜」；阿拉伯人則用「我的黃瓜」；茲庫人對愛人所用的最高級愛稱是「我的小蒜」；而在南斯拉夫的加爾紐拉，則用「我的小草」來表達對戀人的最熾熱的感情。

浪漫的維也納人用「我的小蝸牛」來稱呼心愛的人；布列塔尼人則興奮地把戀人稱作「我的小青魚」；塞爾維亞人稱呼自己的戀人爲「小蟋蟀」時，就會沉浸在最大的幸福之中；而希臘姑娘如果被人稱爲「像黃金蟲一樣」，心裡就異常高興。

芬蘭人思念情人時，就呼喚「溫柔的小樹葉」；日本人則形容戀人爲「哎喲，是美麗的山花」。美國人把戀人稱爲「甜心」；波蘭人把情人比喻爲「餅乾」；立陶宛人把心愛的人稱爲「啤酒」；捷克波希米亞人，最富愛情表現方式的話是「我母親的靈魂」。

有趣的是，台灣一家雜誌曾以「夫婦之間最好用什麼親熱的稱呼」爲題，作過一次調查。調查結果可謂五花八門，多姿多彩。

有人說：我永遠叫妻子「小姐」，因爲她怕老。有人說：雖然我太太已經五十八歲了，可在我眼裡永遠是十八歲，所以我叫她「丫頭」。有人說：我和丈夫是在相親的時候認識的，所以我叫他「相公」。有人說：我叫我老婆「小笨蛋」，不笨怎麼會嫁給我？有人說：常言道「不是冤家不碰頭」，夫妻之間最好的稱呼就是「冤家」！有人說：根據「打是情，罵是愛」的原理，夫妻之間當然是叫「殺千刀」、「老不死」才顯得情深意重！還有人說：我們在親熱的時候，只叫對方名字中最後一個字；要是相互之間出了問題，就連名帶姓地大吼大叫。

喝粥瑣談

艾京

記得孩提時代，一到傷風感冒、發高燒，母親就會囑託專給家人做飯的遠房姨媽給我們熬一鍋粥吃，並嚴禁吃油膩的東西，最多讓我們以鹹鴨蛋、榨菜之類就粥吃。面對白粥時，我往往皺起眉頭，強嚥幾口，比吃中藥還難受。其實母親讓我們避開油膩，無非是讓我們調理腸胃，喝熱粥發發汗，讓身體早日復元。

以粥養生，恐怕只有中國人才懂得這個道理。在《紅樓夢》中就有一段病人喝粥的情節。說是寧國府秦可卿死了，而她的婆婆尤氏因舊疾胃疼發作。臥病在床，無法參與喪事。於是賈珍請了王熙鳳全權操辦。王熙鳳到寧榮國府見到堂兄悲傷過度，堂嫂又病秧秧，不思進食。王熙鳳便假門假事地叫榮國府的廚子每天熬各色各樣的「細粥」送到寧國府。不消說，堂堂的榮國府熬出來的細粥，再加上小菜，其價格肯定不菲。由此可見中國人生病喝粥的習俗由來已久。

中國人喝粥的習慣，算得上源遠流長。在古文字中「饘」（音平聲zhan）是指稠粥（北京人叫糨粥），而稀的才叫「粥」，在北方一律叫稀飯。在過去，窮苦人家吃不起三頓乾飯，便以喝粥搭配日子。《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晚年生活潦倒，吃不起乾飯，在他的詩作裡就有這樣的詩句：「舉家食粥酒長賒。」反映出他的晚景極爲淒慘。宋朝的大詩人秦觀更是「日典春衣非爲酒，家貧食粥已多時。」家貧就只能喝粥，在清代詩人趙翼的《粥詩》找到家貧喝粥的理據：「煮飯何如煮粥強，好同兒女熟商量。一升可作二升用，兩日堪爲六日糧。」以僅兩天的糧食分爲六天來吃夠慘的了。古時粥又是災荒年間難民救命的食品。在古典小說如《水滸傳》、《濟公傳》等有不少情節就提到饑荒年代時，官家或有錢人家設粥廠（又叫粥糊）施捨白粥給荒民的歷史事實。看來粥在那個時代已成爲貧困人家的必需品了。

事過境遷，現在因爲貧而喝粥的觀念也在起變化，不少人爲了養生才喝粥。中國人喝粥南北各異，北方人則以五穀雜糧如玉米渣、高粱、小米及蕎麥等熬粥喝，並被視爲健康食品，特別小米粥更是北方婦女坐月子催奶的恩物。天津人更有在換季節時喝稠粥的習慣，先將大蝦乾炒香與小站稻熬成稠稠的稀飯，然後放津白和適量的細鹽就成了一頓美食。南方的居民則以熬大米和糯米（包括紫糯米）粥爲主，有的則以甜食爲主。但論起喝粥的花樣之多，任何地區都無法與廣東人比擬。除了甜食的粥品外，鹹食的粥品也不下幾十種，其中及第粥和魚生粥更成粵式粥類的佼佼者而名滿天下。改革開放的三十年，北京人的口味也起了變化，以供應南北風味，甚至以滋補養生爲招牌的粥品和西米露洋粥專門店也應運而生，如一家以連鎖經營方式的粥品專門店居然開了九個分店。

印尼人也有喝粥的習俗，相信是傳自中國，不同的是印尼人以喝甜粥爲主。印尼人熬的粥以大米、紫糯米和薏米爲主，到了傍晚這些賣粥的小販推着小車沿街吆喝，或到指定的一條街擺賣。白粥擱白糖，紅粥擱的是椰子紅糖，而以紫糯米和紅糖熬成的粥，吃時需撒上少許新鮮椰子漿。印尼小販也賣鹹粥，只是淡淡的白粥的表面撒上適量的印尼甜醬油、炸葱、炸花生及純薯粉炸的假蝦片。暮色下，圍着小車上微亮的乙炔燈周圍，吃起這些具有熱帶異鄉風味的小吃，眞有另一番風味。